

書名：《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

作者：劉躍進

出版：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

出版日期：2012年3月

頁數：479頁

劉躍進先生的新著《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於2012年3月由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出版了。這是他繼《秦漢文學編年史》之後向學術界捧出的又一項新的重要成果，對當今秦漢文學乃至整個中國文學的研究，都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和理論價值。

此書的創新與價值突出表現在以下三點：

第一，這是學術界第一部從文學地理學角度研究秦漢文學史的著作，立足於新的學術視角，從時間與空間的維度，整理資料，梳理史實，使秦漢文學史的書寫呈現出一幅新圖景。

自20世紀林傳甲《中國文學史》問世，中國文學史的研究大體上就根據歷史的發展脈絡展開，這種研究的長處是重視歷史背景與文人、文學的關係，能將文學史的縱向發展清晰地呈現出來，但往往忽略了文人、文學跟地理文化背景的關係。儘管取得了很大成績，但也往往流於程式化，缺少活潑潑的靈氣。劉先生此書就打破了以往的文學史研究模式，以文獻學研究為基礎，充分考慮秦漢自然地理與歷史地理的因素，從時間與空間縱橫兩個維度，對秦漢文化淵源、嬗變以及文學地理與文人流布作了宏觀考察。又圍繞若干專題，如“江南的開發及其文學的發軔”、“多元文化的融匯與三輔文人群體的形成”、“‘三楚’的疆域及其文學傳統”、“秦漢時期巴蜀文學的百年輝煌”、“河西四郡的建立及其文化意義”、“黃河以北地區的文學發展”等，作深

入細微的研究。此外,還就“齊氣”與“魯學”等問題進行比較深入的探討。這就使秦漢文學史的書寫突破了以往慣有的歷史綫性探索,呈現出時空合一內外兼顧的多維面貌。

誠如陳寅恪先生所云:“苟今世之編著文學史者,能盡取當時諸文人之作品,考定時間先後,空間離合,而總匯於一書,如史家之長編之所為,則其間必有啓發。”^[1]此書將空間離合總匯於一書,不僅關注到秦漢不同區域文化與文學發展的時間脈絡,而且注意給作家、著作繫地,細緻探討作家成長、作品特徵形成背後的地域文化因素。其研究視角令人耳目一新,并使秦漢文學的書寫呈現出特別新穎活潑的樣態,必會對當下中國文學史的重新撰寫提供有益啓示。

第二,在研究方法上,將傳統的實證研究法與文學地理研究法結合起來,立足於文獻學的研究,以整理資料作為學術研究的起點,運用自然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的方法研究文學,首次將秦漢區域文化做了劃分,并對劃分的八個區域文化傳統追根溯源,探其流變,給秦漢文人分布進行“繫地”,拓寬了秦漢文學的研究領域,從而使研究取得了突破性進展。

從地域角度討論中國文學,淵源久遠。《左傳》載季札聘魯觀周樂,即對《詩經》十五國風的不同特徵有所評價;《呂氏春秋·音初》、班固《漢書·地理志》等也論及地理環境對文化與文學的影響;劉勰《文心雕龍·物色》還給出了“山林皋壤,實文思之奧府”,“屈平所以能洞監風騷之情者,抑亦江山之助”的論斷;20世紀初,梁啟超先生《中國地理大勢論》綜論了中國古代南北地理環境對政治、哲學與文學藝術的影響,首創“文學地理”之概念;劉師培先生《南北文學不同論》從宏觀角度討論了南北文學不同特點與地理環境之關係。20世紀九十年代以來,文學地理學的研究漸成熱潮,據統計,1995年至今,“各地的地域性文學史,已經有數百部之多”。^[2]但總體而言,20世紀之前的學人多是感悟式的歸納,缺乏細密的剖析,20世紀之後的成

果則多耽於對地域與文學關係的平面描述。正因覺察到這一點，有學者呼籲：文學地理學的研究“只有充分的、深入細緻的實證研究成果，才能真正讓學術界和讀者廣泛接受，一切浮光掠影的認識，淺嘗輒止的探討和主觀武斷的結論，都有可能敗壞文學地理學的形象”。^[3]

值得一提的是，劉先生專注於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的研究，始於1997年，是在文學地理學熱潮初起時就涉足了這一領域。曹道衡先生指出：“劉躍進同志所以能取得這許多成績，其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他不但有比較深入和寬廣的思路，而且能夠刻苦地鑽研歷史文獻，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4]開闊活躍的學術思路與嚴謹樸實的治學方法，使劉先生形成了言必有據、不事空談的一貫研究風格。這在此書同樣有體現。

譬如，對秦漢文化區域作劃分，是此書研究成功的理論前提，故其在這方面用力甚勤。書中首先理清秦漢文化區域的劃分依據和標準，指出此前從州郡設置、方言調查、經濟發展、區域文化等角度所做的劃分均不盡如人意，秦漢文化區域劃分應綜合考慮，特別應注意自然地理因素。這就展現出其研究方法的突出特點：在堅持傳統實證方法基礎上，綜合運用自然地理學與歷史地理學的方法。然後，將秦漢文化放在特定的時間與空間背景下，劃分為三輔文化、河西文化、巴蜀文化、幽并文化、江南文化、齊魯地區文化、河洛地區文化和荆楚地區文化等八個文化區域。在劃分時，不僅考慮到這些地區的自然地理條件特點，更注意到各區域文化淵源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的交錯、滲透、融合的特性。其中指出：“更為複雜的是荆楚地區的文化，其範圍頗難劃定，因為楚國的勢力範圍始終處在變化之中。特別是到了戰國的中後期，沿長江、淮河流域有所謂‘三楚’之說，主要集中在長江中下游和淮河流域。江淮流域的西部稱為‘西楚’，而東部則為‘東楚’。長江下游的‘南楚’遠至湖南、江西等地。儘管楚國地域遼闊，而其政治文化中心區域主要集中在江

淮地區中西部,尤以今天湖北荊州管轄的郢都為中心。”^[5]劃分了八個秦漢文化區域後,緊接著根據《漢書·儒林傳》、《藝文志》、《後漢書·文苑傳》、《郡國志》以及《隋書·經籍志》等記載,清理、統計這些典籍載錄的文人學者的分布與著作情況。通過統計歸納,得出秦漢時期不同文化區域文人學者和著述的具體資料和所占比例,及其在不同歷史時期呈現的變化,有力證明了秦漢時期八個文化區域在不同時期的發展是很不平衡的。“西漢時期,文化中心在齊魯地區,荆楚地區為另一文化中心。而東漢則轉到河洛地區,而三輔文人則上升為第二位。這可能由於三輔地區曾經是西漢的政治文化中心而積累起來的結果。儘管西漢和東漢的文化中心有所差異,但總體上看,這個時期的文化發展多集中在黃淮流域和江淮流域。”^[6]這一研究,由於是建立在新的學術視角、研究方法和傳統實證基礎上的,是在全面搜集文獻資料之後,由細緻剖析上升為理論綜合研究,從而總結出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的一般規律,因此,不僅結論新穎公允,而且還生動印證了“學會整理資料,是學術研究的起點”的樸素道理。此書下編“秦漢文人分布”,以《漢書·地理志》所載103郡國為單位,以《漢書》、《後漢書》所載作家籍貫為依據,運用文獻統計方法,對秦漢文人分布進行了“繫地”,其研究嚴謹扎實,其資料宏富詳贍,必能給今後同類研究免去諸多檢索之勞。

第三,運用歷史發展觀念,充分注意特定地域文學興衰更替的歷史軌迹,使全書的秦漢文學地理研究表現出時空交融的鮮明特色,得出的結論多令人信服,發人深省。

例如,緒論《秦漢文化淵源及其區域劃分》,提綱挈領抓住了秦漢政治的核心問題,揭示了秦漢政治由霸道到王道、再到外王內霸的變化過程,指出:“此後兩千年,儘管歷代情況多有變化,但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外王內霸的基本思想形態,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這對我們重新思考文學產生的政治文化背景

問題當有所啓迪。又如，第一章《三輔地區文學》，挖掘了三輔地區成爲嬴秦及西漢文化發展的核心地帶的地理與歷史原因——宜農耕，經濟基礎雄厚，可攻可守；揭示了秦漢政權更替、移民政策給三輔地區文化嬗變、文人群體形成、文學創作的基本特徵帶來的巨大影響。還詳細考察了《呂氏春秋》融合稷下學宮各學派學說、倡導國家一統的政治理念和理論體系，揭示其被秦統治者忽視的根源，是因《呂氏春秋》的政治理念跟秦貴族集團的利益與尚法治的歷史文化傳統產生了尖銳矛盾衝突。這就突破了以往將呂不韋悲劇與趙姬糾葛聯繫起來考察的野史視角，顯現出深邃的歷史洞察力。又如，《“魯學”與魯地文化》、《“齊氣”與齊人創作》兩章，通過文獻材料的細緻梳理比較，證明儘管齊魯地域接近，但由於魯國是伯禽代周公行政，“變其俗，革其禮”（《史記·魯周公世家》），齊國則是“太公至國修政，因其俗，簡其禮”（《史記·齊太公世家》），因而形成了不同的文化特色，儘管兩地在秦漢時期均尚經學，但受好學尚禮的魯俗影響，魯學更注重經學的本旨，相對保守；受舒緩自負、重融通意識的齊俗影響，齊學則擅長經學闡釋，不主故常，追求融通。這就生動揭示了齊魯文學不同特質產生的歷史文化根源。另外，《河西走廊文學》、《江南地區文學》兩章，通過細緻的文獻勾稽，發掘了文人遷徙流動對這兩地的文化發展、文人崛起與文學創作帶來的重要促進作用。這也啓示我們在研究文學史時，需要從文學地理學角度關注文人的遷徙流動與文學發展的關係問題。

當然，要將秦漢文學之空間離合完美總匯於一書，畢竟是一項浩大而艱巨的工程，對此，劉先生有清醒認識。他在後記中說，此書與《秦漢文學編年史》都“主要是圍繞著秦漢文學領域作周邊攻堅，還缺乏深入名篇佳作內部的細節探討”。目前，他正全力從事《〈文選〉舊注輯存》的編纂工作，希望能夠對此缺憾有所彌補。有理由相信，通過今後的《文選》研究，劉先生一定

能够彌補他所認識到的缺憾，為學術界捧出又一部新穎而厚重的著作。

廣西師範學院文學院教授 龍文玲

注釋：

- [1] 陳寅恪《元白詩箋證稿》，三聯書店，2001年，第9頁。
- [2] 李仲凡《文學地理學的學科必要性》，曾大興、夏漢寧主編《文學地理學》，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41頁。
- [3] 曾大興《建設與文學史學科雙峰并峙的文學地理學科——文學地理學的昨天、今天和明天》，曾大興、夏漢寧主編《文學地理學》，第21頁。
- [4] 劉躍進《門閩土族與永明文學·序》，三聯書店，1996年，第5頁。
- [5][6] 劉躍進《秦漢文學地理與文人分布》，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12年，第11、49頁。